

從禁捕到漁甲： 明代江浙地區出海捕魚管制措施的變遷

邱仲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摘 要

明初，江浙地區在海禁政策下，漁船不得出海捕魚。由於此舉對生計造成妨礙，故漁民仍常違禁出海。至十六世紀初，朝廷開始有條件放寬，准許單桅漁船在沿海捕魚。這樣的政策一度因嘉靖中葉（1540 年代）的倭寇而中止，但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官方准許雙桅以下漁船，編成海上漁甲、繳納出海漁稅，在東海上從事捕撈。萬曆二年（1574）以後，漁甲組織進一步細緻化，由下而上層層節制，軍事化的傾向愈益濃厚。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官方還禁止漁船越界至它省海域捕魚。伴隨著管制措施逐步放寬，江浙海洋漁業日益擴張，至明代後期達到極盛。其中，冷凍漁船載著大量的海產入港，為沿海居民帶來飽嚙海鮮的機會。但至清初，因鄭氏政權不斷騷擾東南沿海，清廷逐漸加強出海管制，康熙二年（1663）並於海邊樹立界牌，全面禁止百姓穿越，自是海鮮貨源斷絕，百姓也無海魚可吃。

關鍵詞：明代，海禁，漁甲組織，漁稅，海洋漁業

前 言

明代海洋政策之轉為消極，是國史上重要事件之一。黃仁宇曾說：唐宋是外向的，明朝是內向的。唐宋是競爭性的，明朝是非競爭性的。又說：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傳統強的大陸國家，國際貿易不容易給予重大的壓力，促使它改變傳統的組織和習慣。明代嘉靖年間的禦倭戰事，即表現傳統的農村經濟仍能抵禦新興的商業組織。萬曆年間中國與新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力量直接接觸，雖然

沒有節節戰勝，閉門自守還是力有餘裕。(註¹)其實，黃仁宇所指具有「競爭性」的唐宋帝國，與「非競爭性」的明朝，同樣是一個大陸性國家，即使唐宋比較注重國際貿易，卻也未能促使它改變傳統的組織和習慣而轉變成為海洋性帝國。問題在於，唐宋時期的東亞並未出現海洋上的對手，而明朝則全然不同。從明初以來的倭寇，(註²)到明中葉的佛郎機、紅毛番等，(註³)都是不易處理的海上勢力。就此而言，明帝國海洋情勢之複雜，實為前此朝代所未有，雖然其所採取的是消極的海洋政策，但所面對的反而是一個「競爭性」的國際局勢。

本文所要討論的，即是在海禁政策下對於海洋漁業的管理措施及其變遷的過程。眾所皆知，明代的海禁時嚴時弛，洪武和永樂年間執行較嚴，正統以後日趨鬆弛，至嘉靖中葉因倭寇大舉來犯轉為緊縮；在倭亂後，則局部開放漳州月港，准許商船出海貿易。萬曆末年以後，因海盜問題日益嚴重，曾重申禁令。(註⁴)在這個過程中，對於漁民出海捕魚的管制措施，也有著波動起伏。惟截至目前為止，對於這個問題尚無比較完整的討論。

1. 黃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食貨月刊》復刊 15:7/8 (1986.01)，頁 5、9。
2. 關於明代倭寇的專著，如長谷川正氣，《倭寇》(東京：東京堂，1914)；李晉華編，《三百年前倭禍考》(上海：國民外交委員會，1933)；黎光明，《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3)；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4)；吳重翰，《明代倭寇犯華史略》(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孟錦華，《明代兩浙倭寇》(金華：國民出版社，1940)；登丸福壽、茂木秀一郎，《倭寇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42)；李光璧，《明代禦倭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呼子丈太朗，《倭寇史考》(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60)；石原道博，《倭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東京：至文堂，1966)；《倭寇——海の歴史》(東京：教育社，1975)；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永原慶二、三浦圭一等，《遣明船と倭寇》(東京：毎日新聞社，1979)；戴裔煊，《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鄭樸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太田弘毅，《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橫濱：春風社，2002)；范中義、余晰綱，《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04)。
3. 有關於歐洲海上勢力的東來，參見 T'ien-tse Chang (張天澤)，*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yden: E.J. Brill, 1934)；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5)；Anders Ljungstedt (龍思泰) 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另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頁 191-344。
4. 相關的著作甚多，如張維華，《明代海外貿易簡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3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88)，頁 345-368；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陳尚勝，《「懷夷」與「抑商」：明代海洋力量興衰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鄭永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晁中辰，《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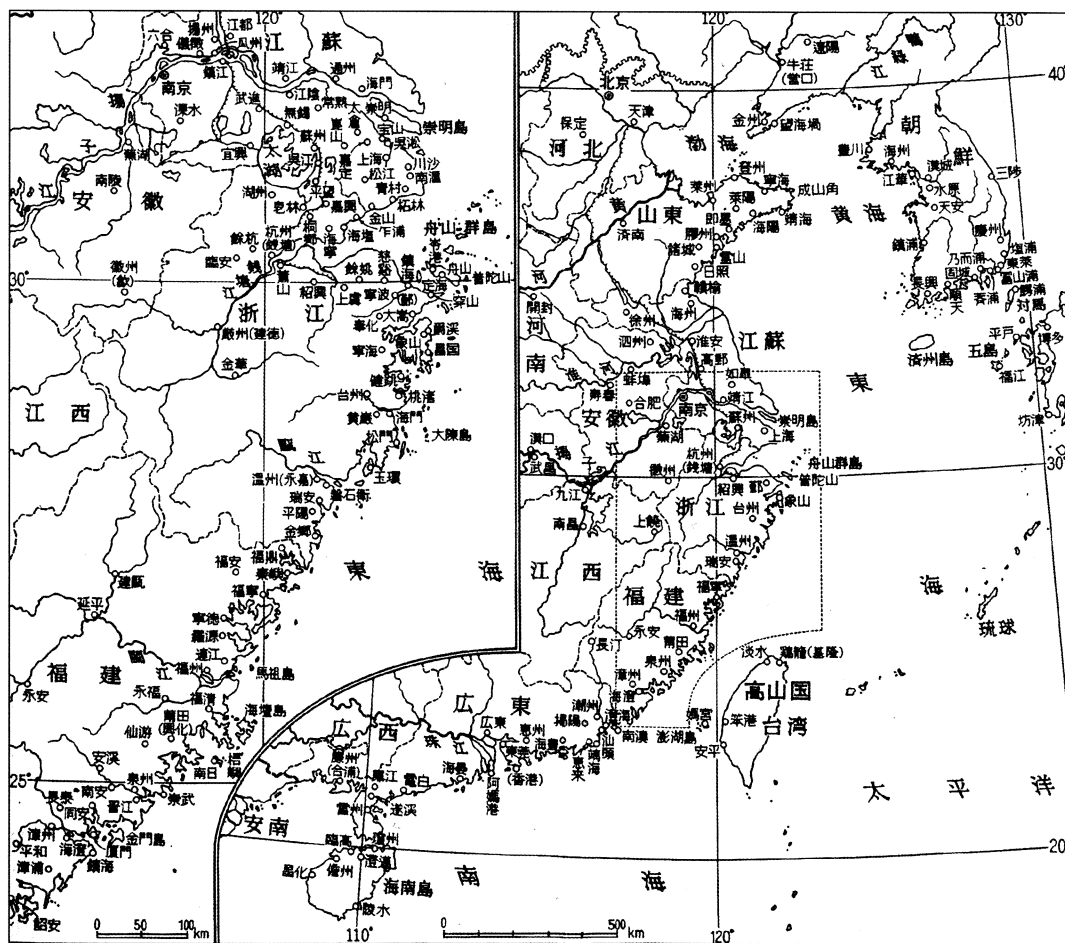
近一世紀以來，雖然有不少通論性的中國漁業史著作，但對於清代以前著墨不多，論及明代自是極為簡略。^(註5)在通論性的漁業史之外，曹永和深究明末臺灣的海洋漁業，中村治兵衛考察明代的魚課與河泊所，吳智和討論明代的漁戶與養殖事業，三木聰析論明代福建的魚課，顧瑞述及明代貢鱗魚、鱗魚等問題，對於明代漁業史均有重大貢獻。^(註6)專書方面，則有歐陽宗書對明清海洋經濟的探討，與尹玲玲針對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的討論。^(註7)總結以上諸家所述，主要討論的是淡水漁業，談及海洋漁業者較少。有關於明代海禁之下海洋漁業的管理措施，以往學者雖已觸及（如三木聰、顧瑞、歐陽宗書），但所述還比較簡略，^(註8)對於制度變遷（特別是漁甲制）的討論亦相當有限，故留有進一步細究的空間。本文主要所要處理的，乃是明代江浙地區出海捕魚管制措施逐步放寬的過程，與漁甲制的出現及其變遷，其中偶爾會牽涉到閩粵兩省，但主體仍限於江浙沿海。

一、東海漁場

今日中國的海岸線，南起廣東的東京灣，北至遼東的鴨綠江口，綿延達一萬八千公里。依照今日的畫分，這條海岸線分別濱臨渤海、黃海、東海、南海這四個海域。其中，遼東半島至山東半島之弧形海域為渤海，山東半島至長江口為黃海海域，長江口南岸至廣東潮州南澳島為東海海域，南澳島以南則為南海海域。

5. 如沈同芳，《中國漁業歷史》（收入其《萬物炊累室類稿甲編》，宣統三年刊本）；李士豪、屈若寧合著之《中國漁業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張震東、楊金森，《中國海洋漁業簡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劉惠生，《福建漁業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趙以忠等，《舟山漁志》（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叢子明、李挺主編，《中國漁業史》（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郭振民，《嵎泗漁業史話》（北京：海洋出版社，1995）。
6.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分見《臺灣銀行季刊》6:1（1953）、7:4（1955），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157-253。中村治兵衛，〈明初の魚課と河泊所官の地域迴避〉、〈明代の河泊所と漁民〉，收入氏著《中國漁業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5），頁111-135、137-180。吳智和，〈明代漁戶與養殖事業〉，見《明史研究專刊》2（1978），頁109-1640。三木聰，〈明代の福建における魚課について〉，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上冊，頁415-440。顧瑞，〈太湖地區養殖漁業源流初考〉、〈明清海禁與漁業〉、〈鱗魚與鱗貢〉、〈明代江陰鱗貢〉，收於氏著《漁史文集》（臺北：淑馨出版社，1992），頁33-48、51-57、112-126、127-128。
7. 歐陽宗書，《海上人家——海洋漁業經濟與漁民社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尹玲玲，《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8. 三木聰，〈明代の福建における魚課について〉，頁423-424；顧瑞，〈明清海禁與漁業〉，頁52；歐陽宗書，《海上人家——海洋漁業經濟與漁民社會》，頁66-68。

(註 9)在這四個海域之中，東海位於北亞熱帶和中亞熱帶，水文主要受南下的黃海冷水團與北上的臺灣暖流、貼近海岸的海流三者周年推移與變動的影響，因此南北各種經濟魚類無不迴游於這一海域。另外，東海所在的廣闊大陸棚，其海底平坦，水質肥沃，浮游的魚餌極為豐富，為各種魚類提供了良好的繁殖、捕餌、過冬的條件，構成中國最重要的優良漁場。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東海海域盛產的帶魚，產量約占全國五分之四以上；而大黃魚、小黃魚、墨魚及海蜇，一般也占全



圖一：明代沿海形勢圖

※圖版來源：據石原道博，《倭寇》，書末「倭寇關係地圖」改製。

9. 李榮生編著，《中國水產地理》（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頁 16-23。

國產量的百分之七十至九十。(註 10)

明代對於海域的界定雖與現代有所不同，但通稱江浙東面的大海為東海，其洋流與水文狀況應與今日相當。在現代東海海域當中，長江三角洲附近海面，由於江流關係，浮游生物甚夥，魚類本其食餌天性，群集生棲；更以暖流影響及水深條件適宜，便於魚類迴游、產卵、孵育，故魚群靡不集於此。(註 11)明中葉，陸容(1436-1494)曾指出：「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是以漁船來此作業者甚多。(註 12)至於浙江方面，由松江金山衛斜向西南，至錢塘江口，再折而往東，經紹興至寧波，再往南抵溫州，這「Y」字形的海岸，也是魚產極其豐富的洋面。在這一帶，濱臨杭州灣及東海的嘉興、杭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等府，也均分沾漁鹽之利。明末，陸人龍在所撰的小說《型世言》中，曾有這樣一段話：「浙江一省，杭、嘉、寧、紹、台、溫都邊著海，這海裡出的是珊瑚、瑪瑙、夜明珠、硨磲、玳瑁、鮫鮓，這還是不容易得的物件。有兩件極大利、人常得的，乃是漁鹽。每日大小魚船出海，管甚大鯨小鯢，一罟打來貨賣。還又有石首、鯧魚、鰱魚、呼魚、鰻鱺各樣可以做鯊，烏賊、海菜、海僧可以做乾。其餘蝦子、蝦乾、紫菜、石花、燕窩、魚翅、蛤蜊、龜甲、吐蛭、風饌、鱸塗、江瑤、魚螺，那件不出海中，供人食用、貨販？」(註 13)可見明代浙江沿海的魚類資源極其豐富。

早在元代時，浙東海域的魚類資源就已相當豐富，(註 14)而黃魚又是當地漁船出海採捕最主要的目標。據至正《四明續志》(至正二年(1342)刊)記載，每年四、五月間，「海郡民發巨艘，入洋山競取，有潮汛往來，謂之洋山魚。」(註 15)所謂的「洋山魚」，即指產於洋山一帶海面的黃魚。在元明的文獻中，洋山係指介於南直隸松江府、浙江寧波府之間的海域，大約指今日嵎泗列島一帶，但有時也包含舟山群島在內，為當時江浙最大的漁場所在。嘉靖年間，鄭若曾曾經談到，江

10. 《中國水產地理》，頁 19-20、52。

11. 張寶樹，《中國漁業生物資源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52。

12. 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卷 13，頁 156。

13. 陸人龍，《型世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據漢城大學奎閣藏崇禎刊本影印，1992)，卷 7，第 25 回〈兇徒失妻失財·善士得婦得貨〉，頁 2a-b。

14. 大德《昌國州圖志》就記載了魚蝦之類海產，計有五十七種。見大德《昌國州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咸豐四年刊本，1983)，卷 8〈物土志·物產〉，頁 18a-20a。

15. 至正《四明續志》(《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0]第 705 冊，影印明抄本)，卷 5〈土產·水族〉，頁 550。

浙海上盛產黃魚之地在淡水門、洋山一帶，洋山位於金山衛東南大七山、小七山之外，至蘇州的劉家河港，「順帆不過一潮而已」；而淡水門就在洋山西方，「兩山相峙如門」，故稱為淡水門，這一海域「即黃魚之淵藪也」。(註16)因此，附近漁場乃是明代作業船隻最多的洋面。萬曆年間，王士性曾經談到：

明、台濱海郡邑，乃大海汪洋，無境界中，人各有張莆繫網之處，只插一標，能自認之，丈尺不差。……東南境界，不獨人生齒繁多，即海水內魚蝦，桅柁終日，何可以億兆計。若淮北、膠東、登、萊左右，便覺魚船有數。(註17)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在明帝國沿海各漁場當中，寧波、台州兩府的外海，魚蝦等海產難以數計，在此作業的漁船也多。相較之下，淮北及山東半島的膠東、登州、萊州等海面，作業的船隻就少一些。當時，具有地利之便的浙東州縣，百姓就多半依靠捕魚維生，如嘉靖《定海縣志》(嘉靖四十二年(1563)刊本)云：「利近東海，民資漁罟出沒，衣食之源過於農耕，遂多重彼輕此，野有蕪土而人便風濤。」(註18)在更南的溫州府太平縣，濱海居民亦多以捕魚、賣魚為生。嘉靖《太平縣志》(嘉靖十九年(1540)刻本)就曾記述當地漁民，「貨海魚者，率用海舶，在附近海洋，網取黃魚為養，散鬻于各處，頗有羨利。」(註19)

二、嘉靖倭寇前的捕魚管制

由上節可知，由於東海魚產豐富，故江浙沿海漁民多倚靠捕魚為生。然而，明代自洪武年間起即實施海禁，嚴禁百姓出海，這一政策雖與漁業經濟相衝突，但卻是明代對海洋的基本政策。究其根源，海禁政策並非始自明代。據學者指出，早在元世祖時已實施海禁，禁止商賈出海與諸番貿易。不過，後來政策搖擺不定，

16. 鄭若曾，〈黃魚船議一〉，《江南經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728冊)，卷8上，頁21a-b。

17.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卷4〈江南諸省〉，頁73。

18. 嘉靖《定海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29冊)，卷5〈疆域志·風俗〉，頁5b-6a。

19. 嘉靖《太平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6冊)，卷3〈食貨志〉，頁3a。

時禁時弛。(註 20)明代海禁，一般認為肇始於洪武四年（1371）。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太祖於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吳禎將方國珍在溫州、台州、慶元三府的舊部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百姓曾充當過船戶者，共計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安插至各沿海衛所為軍，「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註 21)同一個月，又降諭大都督府官員云：「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濱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為者乎？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于刑憲矣。爾其遣人諭之，有犯者論如律。」(註 22)由這兩則資料看來，海禁在此之前已經實施。而明太祖之所以實施海禁，大部份記載都指出與方國珍的殘餘勢力在海上橫行有關。(註 23)

在海禁實施之後，私自出海被視為莫大罪名。(註 24)而在此之後，海禁的禁令也不斷重申。有關於明代的海禁政策，學界已有相當多的討論，在此不多贅述。總結來說，明代海禁包含兩點，即嚴禁未經許可私自出海及下海通商。其中，禁止漁船出海捕魚的禁令，如洪武十七年（1384）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制居民入海捕魚。(註 25)又英宗在即位以後，因為官員奏稱：「豪頑之徒，私造船下海捕魚」，恐其導引倭寇登岸，戶部認為：「今海道正欲隄備，宜勅浙江三司，諭沿海衛所嚴為禁約」，於是在宣德十年（1435）七月，重申私自下海捕魚之禁。(註 26)

有趣的是，官軍管制漁船出海太嚴，甚至影響到上貢黃魚的捕撈。如浙江嘉興府定例「歲進黃魚三百尾，俱行乍浦河泊所小滿時節採捕，沿途換冰，接棹到京，通政使司投本，尚膳監交收，禮部批迴。」(註 27)但由於官軍嚴格查緝，採捕黃

20. 參見大隅晶子，〈明代洪武帝の海禁政策と海外貿易〉，收於《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上冊，頁 479-519。並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頁 7。
21.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印行，1962。以下所引明各朝實錄并同），卷 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條，頁 3b。
22. 《明太祖實錄》，卷 70，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條，頁 7a-b。
23. 有關於明初海禁政策的形成背景，參見曹永和，〈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 41-70；奧崎裕司，〈方國珍の亂と倭寇〉，收於《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上冊，頁 479-496；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頁 10。
24. 洪武十三年年初，御史中丞涂節告發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其罪狀之一即有「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見《明太祖實錄》，卷 129，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條，頁 2b。
25. 《明太祖實錄》，卷 159，洪武十七年正月壬戌條，頁 4b。
26. 《明英宗實錄》，卷 7，宣德十年七月己丑條，頁 8a。
27. 俞汝楫等纂，《禮部志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7-598 冊），卷 38 〈主客清吏司·歲進·黃魚〉，頁 39a。

魚困難，以致無法進貢。事據天順二年（1458）英宗降勅指責備倭都督僉事翁紹宗云：

嘉興乍浦河泊所歲進黃魚係舊例，近年以來因爾不許魚船越境出海，又令官軍擒拏，以致不得採捕，遂缺供薦。先已取爾招服，爾宜自咎，遵奉朝命，督令所轄官司，毋得阻滯，顧乃全不關心。今歲，魚船又被攔截索錢，不得採捕。及船戶具告前情，自知阻誤，虛詞妄奏，遮掩已過。……今復從寬，且不拏問，罰俸一年，令爾自省。若再恬然不改，阻誤歲進，自取禍敗，決不可逃。（註28）

又據資料記載：「初浙江歲貢黃魚，有自常州夏港口出海採捕者，引致倭寇，備倭都督僉事翁紹宗頗繩之以法」，漁民採捕黃魚遂受影響，鎮守浙江太監盧永等乃上章彈奏翁紹宗「阻誤進奉」，紹宗坐罰俸一年。（註29）由此可知，浙江漁民出海採捕上貢黃魚的地點，一度曾在長江邊的南直隸常州府夏港。地點之所以會在這裡，可能是由此出港乃入長江而非入東海，比較不會遭到稽查。然而，這在管理上卻比較麻煩。天順三年（1459），鎮守太監盧永覺得夏港距離浙江遙遠，而且非浙江所屬地方，採捕之時不得躬親閱視，於是奏請改在浙江錢塘縣赭山巡檢司出海較為方便，後經英宗批准。（註30）此後浙江漁民出海捕撈上貢的黃魚，不用由長江的常州府夏港出海。

而在朝廷嚴禁百姓出海的情況下，最有機會出海者為沿海衛所的巡海官軍。由於沿海漁民無法出海，漁貨相對短缺，海魚價格自然攀升，在有利可圖的誘使下，許多軍人乃出海捕魚取利，採捕從而成為軍人的重要利潤之一。正統五年（1440），浙江溫州府永嘉縣縣丞方珍奏言：沙園千戶所軍人「月食官儲，又假捕倭、給行糧，出海取魚以為利，其所管頭目得賄，置不問。」為此，朝廷重申禁止軍人出海捕魚。（註31）但正統七年（1442）年底，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在上奏時仍然談到：「備倭戰船官軍，近年以哨瞭為名停泊海港，竊還其家者有之，販鬻

28. 《明英宗實錄》，卷293，天順二年七月甲寅條，頁10b。

29. 《明英宗實錄》，卷309，天順三年十一月壬寅條，頁5a。

30. 《明英宗實錄》，卷309，天順三年十一月壬寅條，頁5a-b。

31. 《明英宗實錄》，卷65，正統五年三月壬戌條，頁10a。

私鹽、捕魚採薪者亦有之。」^(註 32)稍後在正統十一年（1446），總督浙江備倭事都指揮使李信等人上奏指出，巡海都指揮同知王瑛收受賄賂，縱容所屬官軍出海捕魚，請求將其發下巡按御史究問。^(註 33)景泰二年（1451），鎮守浙江兵部左侍郎孫原貞也上奏：總督備倭事都指揮僉事王謙等人，收受濱海軍民賄賂，縱其下海捕魚，請治其罪。^(註 34)

軍民賄賂軍官以便出海捕魚的現象，反應了這個政策違反經濟的自然規律，要禁制是不可能的。當時，江浙的漁民一有機會就出海採捕，特別是經濟價值最高的黃魚，更是大家競相捕撈的目標。成化初年，杭州府沿海的漁民，就常出海捕撈江魚，又名洋山魚，即俗稱的黃魚。^(註 35)而在四、五月黃魚大至時，浙江溫州、台州、寧波等地的漁船，也常北上至蘇州太倉、松江金山衛外海這一帶捕魚。^(註 36)在當時，出海捕魚被視為非法之事，漁船往往逃避盤查，甚至因此而與官軍發生衝突。《蘇州府纂修識略》就記載了一件與此有關的凶案。事緣於弘治七年（1494）四月間黃魚大至時，蘇州漁民黃信駕著冰鮮船出海捕撈，夜裏返航時，適遇太倉衛舍人朱璽帶領兵船巡海，黃信不接受盤詰，因而打了起來，黃信竟被朱璽戳死，為此朱璽還被判處重罪。^(註 37)在明代中葉，漁民冒著波濤與軍方的盤查這雙重威脅出海捕魚，其實糾結著生計問題與經濟利益這兩個因素，泰半不是有意通番或蓄意謀反。然而，有些士大夫還是不贊成開放海禁。陸容曾云：「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為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他覺得海禁還是有其必要，理由有三，其一為：「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次，「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另外，雖無福建、廣東「私通外蕃，以啓邊患」之事，但其「採取淡菜、龜腳、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註 38)以上這些因素，容或為必須海禁的因素，然就問題之解

32. 《明英宗實錄》，卷 98，正統七年十一月壬午條，頁 10a。

33. 《明英宗實錄》，卷 145，正統十一年九月辛卯條，頁 8a。

34. 《明英宗實錄》，卷 208，景泰二年九月甲寅條，頁 6b。

35. 成化《杭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5 冊），卷 60〈紀遺〉，頁 22a-b。

36. 陸容，《菽園雜記》，卷 13，頁 156。

37. 楊循吉，《蘇州府纂修識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史部第 46 冊），卷 1〈政事上·恤刑〉，頁 24a。

38. 陸容，《菽園雜記》，卷 13，頁 156。

決而言，畢竟太過消極。

不過，在厲行海禁政策之下，倒是有地方官冒著被斥責的危險挺身為民。宣德六年（1431），寧波知府鄭珞曾經奏請「弛出海捕魚之禁以利民」。宣宗看到奏章之後非但不准，而且還斥責其「知利民而不知為民患」，因為「往者倭寇頻肆劫掠，皆由姦民捕魚者導引，海濱之民屢遭劫掠，皇祖深思遠慮，故下令禁止。」鄭珞既為縣令，雖「當順民之情，亦當思其患而預防之。若貪目前小利，而無久遠之計，豈智者所為？宜遵舊禁，毋啓民患。」^{（註 39）}又，弘治十六年（1503），寧波府知府伍符以境內災荒，曾聽任百姓出海捕魚，依船隻大小納粟，以備賑濟之用。結果遭到巡視海道按察副使張鸞彈劾，奏章上到朝廷，孝宗命巡按御史履勘，再報至都察院覆奏。最後，孝宗以伍符急於救荒，故有此權宜措施，乃原有其罪，僅罰俸一月。^{（註 40）}

另一方面，自十六世紀初起，官方也開始對出海捕魚稍加弛禁。弘治十三年（1500）重申海禁時，曾令：「若小民撐使小船，於海邊近處捕取漁蝦、採打柴木者，巡捕官兵，不許擾害。」^{（註 41）}弘治十七年（1504），兵科給事中張弘至又建議「均海利」，內言：「海濱之民，以捕魚為生，編竹為筏，隨潮往來，宜令所司稍弛科禁，使之安業，而盜自弭。」孝宗命所司議處以聞。^{（註 42）}事經近一年，南直隸巡撫魏紳於弘治十八年（1505）奉旨議上所奏，奏章中指出：「濱海軍民，多以漁採為生，大家往往多置船隻以窺租利，初心未必盡欲為非，但一時生計迫促，致生他變者，容亦有之。」應行文沿海各府、各衛官署，將其船首、船尾，俱刻上字號，稽查其出入，明定其人數，如有違禁者，漁船充公，並連坐其鄰里、工匠。此一建議經兵部覆奏，聖旨從其所議。^{（註 43）}對於漁民來說，這一部份開放的措施自是比較有利的，至少可在取得許可的情況下出海捕魚。至武宗即位後，對於漁船出海的管制又進一步放寬。正德元年（1506），蘇州府崇明縣半洋沙海賊施天傑、施天常、鈕西山等聚眾劫掠，經朝廷派員會勦之後平定。^{（註 44）}在平定之後，

39. 《明宣宗實錄》，卷 83，宣德六年九月壬申條，頁 3b。

40. 《明孝宗實錄》，卷 206，弘治十六年十二月戊戌條，頁 1b。

41. 萬曆《大明會典》（臺北：東南出版社影印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1963），卷 132〈各鎮通例〉，頁 20b。

42. 《明孝宗實錄》，卷 209，弘治十七年三月丁丑條，頁 7b。

43. 《明孝宗實錄》，卷 222，弘治十八年三月壬寅條，頁 8b。

44. 《明武宗實錄》，卷 13，正德元年五月己亥條，頁 10b；卷 14，正德元年六月己巳條，頁 7a；卷 17，正德元年九月庚辰條，頁 1b-2a。

巡撫蘇松右副都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巡江御史張昊會奏預防地方六事，其中一事談到：

沿海各沙民家，有雙桅大船，出入江洋，興販魚鹽，交通流民，恣行劫掠，宜悉令改造，不悛者沒其船貨，而發遣其人。若用小船於近地捕魚採薪，及以蒜靛附船貿易者聽之。然亦不得上過鎮江、下過嘉興，庶萌孽不致滋蔓。

事經兵部覆議，認為其事可行，朝廷亦批可。(註45)自此以後，允許漁民以小船出海捕魚，但這些江南的漁船，僅能在鎮江以下的長江、嘉興以北的沿海水域從事捕撈。而在嘉靖四年（1525），兵部呈請浙江、福建的海船，祇要是雙桅即加以逮捕，所載貨物以番物論，聖旨云：「沿海居民所造捕鮮舡，毋得槩毀，他如所議行」，(註46)顯然還是將漁船與商船加以區別，漁船得到比較寬容的對待。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六年（1527），周懋蒞任寧波府定海知縣，詢問當地父老甘苦，父老云：「定故業海，於時海寇肆暴，官爲厲禁。且歲比不登，民胥嗷嗷。」周懋認為：「茲，民之所以爲生也」，即下令弛禁，「民甚賴之」。(註47)

在十六世紀初以降，朝廷對漁民出海管制逐步放寬的情況下，漁船出海捕魚變得較有理由。正德《松江府志》（正德七年（1512）刊）就記載該府沿海漁民，在盛夏出海捕取鰮魚，以冰塊加以冷凍，入港後「銜鬻鄰郡，謂之冰鮮」。(註48)另外，嘉靖《通州志》（嘉靖九年刊本）也記載：

通州之東為大海，南通閩越，北通燕齊，而其東則日本諸番也，故航海有禁。然海濱之漁，乘風逐利，南有至溫州者，北有至山東而望成山者。……今石港、呂四等場，有採鰮魚舟，可數百艘。給帖於官，名曰沿江捕魚，實則入海。夏四、五月之間，迎潮而東，倏忽千里，不避風波，曰會魚信。(註49)

45. 《明武宗實錄》，卷17，正德元年九月壬辰條，頁8b。

46. 《明世宗實錄》，卷54，嘉靖四年八月甲辰條，頁4a。

47. 嘉靖《定海縣志》，卷11〈列傳·名宦〉，頁8a。

48. 正德《松江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6冊），卷5〈土產〉，頁15b。並見黃省曾，《養魚經》（《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47冊），頁571。

49. 嘉靖《通州志》，卷3〈官政〉，頁16b。

可見揚州府通州的漁民出海，北可達山東半島的成山衛附近，南則至浙江溫州海域。通州石港及呂四場等地漁民，在陰曆四、五月出海捕鱸魚時，原則上多以「沿江捕魚」的名義向官方提出申請，而事實上是出海捕魚。這裡所謂的「沿江捕魚」，應該就是正德元年所放寬的准許在鎮江以下江面捕魚。

除了通州之外，杭州、蘇州漁民也多出海捕魚。嘉靖初年，田汝成曾說：杭州漁民出海捕黃魚，「以竹筴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甚至「魚多而力不能舉，懼覆舟者，則截網使去。」^(註 50)嘉靖年間，鄭若曾（蘇州崑山人，1503-1570）亦指出：

每年四月船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浹旬之間，浙人曝魚成鮓，蘇人冰魚鬻鮮，其獲利不啻幾萬金也。^(註 51)

他又談到：蘇州的沙船出海，每艘船的租金為銀二十餘兩，網業銀則十餘兩，此外又有雇工、食米、木柴、燒酒及祭神所用豬羊等費用。其每船工食之數，大者近三十人，小者近二十人。漁獲量多者或二、三萬尾，少者或千尾、或百尾，甚至於無所獲。而所獲之魚亦有大有小，大者每千尾值銀二十兩，次者十四、五兩，又次者十兩以下。^(註 52)由此推之，每艘漁船的漁獲量，最高可賺得銀四百兩至六百兩。然而並非每艘船都能如此，運氣差的有時甚至血本無歸，沈文楨（寧波鄞縣人，1494-1546）就是一例。據王世貞所撰墓誌銘云：沈氏世為鄞縣大族，文楨之父沈廷曾以納粟授宣義郎。文楨好交際，又有俠風，不吝餽贈，因而家貲日減。生平習書法，善寫方丈大字，豔羨叔父在武宗宮中為中書舍人，因前往北京尋求機會，在京師兩年毫無所獲，祇好回到浙江，於西湖邊上開酒肆賣酒。但喝酒者多賒欠，為此資財半空。他想家濱東海，「即不能署高陽長，庶幾雄於漁師哉！」於是以銀百兩買了船，其它器物、罟網、米糧也花了百兩左右。但出海只捕到「若三石盍」的大蟹一隻，竟連一條魚也無所獲，因此資本大損，家產只贖三成。乃向其它漁船買「魚膾枯」，轉賣至杭州、紹興等府，倒楣的是「魚價輒不登」，故

50.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臺北：木鐸出版社影印點校本，1982），卷 24〈委巷叢談〉，頁 440。

51. 鄭若曾，〈黃魚船議一〉，《江南經略》，卷 8 上，頁 19b-20a。

52. 鄭若曾，〈黃魚船議二〉，《江南經略》，卷 8 上，頁 22b-23a。

也沒賺到錢。最後一年更遇上大雨連綿，「鹽價驟貴」，而所買的魚又因為一直下雨，「過時不得暴」；等到雨稍歇可以曬魚，這些魚「觸烈日，盡餒臭」，勉強將其運至嵎山中賤賣，僅換得「菽麥十餘石，綿數十鈞，他果菜數種，竹木器數十」，因是益形困窘，回至家時貲產已盡，不能再做生意，「諸傭徒盡亡去」。文楨為此抑鬱寡歡，「杜門者數年」。(註 53)

三、嘉靖後期漁甲制的出現

明代對於海洋漁業的管理措施，在嘉靖中葉又出現新的發展，而其原因與倭寇有關。據陳懋恆的考察，南直隸在洪武二年（1369）至永樂十六年（1418）間，曾經五度受到倭寇侵擾，此後直至嘉靖三十年（1551），有一百多年沿海並無戰事。(註 54)在浙江方面，倭寇自洪武二年至成化二年（1466）時常來犯，此後停歇了一段時間，至嘉靖十二年（1533）後乃又陸續侵入。(註 55)由此看來，江浙沿海在十五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初，有六十多年較為平靜，這也是官方逐漸鬆弛漁民出海管制的背景所在。然而，在十六世紀初，伴隨著葡萄牙人東來，原有的走私貿易愈益盛行，海上商販與陸地窩主之間存在許多貿易糾紛，遂使海防的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

明朝長期以來實施海禁的結果，使得出海貿易淪為巨室與豪強所獨占的利益。而在實質上，也唯有這些具財勢、有關係的人物，才能周旋官府打通關節，與海上外來勢力進行交易。正如萬曆末年沈德符所言：「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實貨，靳不與直，以故積憤稱兵。」(註 56)這裡所謂的島夷「積憤稱兵」，即葉權（1522-1578）所云嘉靖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546、1547）間，「海禁寬弛，浙東海邊勢家，以絲緞之類，與番船交易，久而相習，來則以番貨託之。後遂不償其

53. 王世貞，〈漁江沈君墓誌銘〉，《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據萬曆間世經堂刊本影印，1976），卷 92，頁 6b-7a。

54. 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頁 48-70。

55. 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頁 70-84。

5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卷 12〈戶部·勸農〉，「海上市舶司」條，頁 317。

值，海商無所訴，一旦突至，放火殺數十人。」^(註 57)又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闖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于餘姚謝氏」，謝氏積欠王直等大量貨款，彼等一再催討，謝氏自思欠多無法償還，於是恐嚇說：「吾將首汝于官」，王直等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註 58)其事發生在嘉靖二十六年，此後王直、徐海、陳東、麻葉等海賊各股並起，東南海上遂無寧日，^(註 59)而江浙、閩廣沿海也連續受到侵擾達十餘年才安靖。^(註 60)

眾所皆知，倭寇的根據地在五島，當其自北橫海而來，必先越過東海，故在江浙陸地受到侵犯之前，海上漁民常先與其遭遇。嘉靖年間，鄭若曾曾說：「向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以海為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但陳錢山、下八山這一帶，為倭寇南來航道所必經，每年倭船入寇，自五島開洋，順著東北風，五、六晝夜，即至陳錢、下八海面，再分鯨進犯福建、浙江、南直隸，因此寧波漁民常先與其遭遇而受到劫掠，或被脅迫做嚮導。^(註 61)實際上，受害的並不祇寧波的漁民，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錢塘縣人錢鉞等出海至魚洋，因與來犯的倭寇遭遇而被擄，受脅迫引導倭船進海門，倭寇至地名兵馬司處上岸，旋被募兵擊退，倭寇又轉至西興，傷了一名老人，但沒搶到太多東西，後隨潮汐退出海去。浙江巡撫王忬（1507-1560）因此將錢鉞問罪，並奏請嚴禁漁船出海採捕鮮魚。^(註 62)此即鄭若曾所云：「自倭變後，當道慮倭偽充漁人，擄漁舟混入，且執縛漁人為引導之計，執鎖漁船為幫備之資，又有賊因兵船追擊，

57. 葉權，《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頁 8-9。

58. 《明世宗實錄》，卷 350，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條，頁 1b。

59.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卷 81〈食貨志·市舶〉，頁 1981。

60. 有關於嘉靖年間的倭亂，參見片山誠二郎，〈明代海上密貿易と沿海地方郷紳層——朱紬の海禁政策強行における挫折の過程を通しての一考察〉，《歷史學研究》164 號（1952），頁 23-32；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6 本上冊（1965），頁 375-418；〈嘉靖中期的私販寇亂及朱紬禁海經過〉，見氏著《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1966），頁 125-149；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41-160；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師大歷史學報》第 8 期（1980），頁 91-111；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羣島的走私貿易〉，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1984），頁 71-96；鄭樑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四)》（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 1-154；《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37-217。

61. 鄭若曾，《籌海圖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據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影印，1990），卷 12〈經略二·禦海洋〉，總頁 1036-1037。

62. 萬曆《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萬曆七年刊本影印，1983），卷 6〈國朝郡事紀下〉，頁 13a-b。

逼入內地者有之，有賊船趕漁船，乘勢混入內港者有之，莫之能辨，遂禁止採捕，莫敢開端。」^(註 63)

然而，這樣的政策，對倚海為生的漁民影響甚鉅。鄭若曾對此就深不以為然：「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查考「祖宗之意，止禁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海、販糴于鄰省也。」只要針對採捕的漁船，規定其僅能以平底、單桅出海，再以記號識別，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再檢查其出海所帶，除米、水之外，是否為違禁之物；回港除魚蝦之外，是否攜帶番貨。如此一來，問題應可降低，漁民生計也可兼顧。^(註 64)因此他說：「片板不許下海，舊制也。今之沙民，採捕為生，禁之太甚，別生他慮，此下海之禁不必泥也。」^(註 65)嘉靖三十二年，他在答覆松江知府方廉時又提到：沿海民戶及竈戶，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出海、不畏風濤，應該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勦」。在漁民而言，有魚可捕，生計不致受到影響，亦無須挺而走險私自泛海；在官方而言，則省卻造船與募兵之費，實屬一舉兩得。^(註 66)他在〈論黃魚船之利〉中又指出：東海上洋山、淡水門的黃魚漁場，是倭寇進犯蘇州、松江沿海必經之地，江浙的黃魚船皆在此處作業。這些漁船在「海中常防劫奪，每船必自募慣出海之人，格鬪則勇敢也，器械則犀利也，風濤則便習也」，倭寇若見遍海皆是黃魚船，自然不敢隨便肆虐，靠岸劫掠的可能性相對縮小。若能將黃魚船編組，對海防實有極大助益。^(註 67)

編組漁甲

有關於編組漁船，早在景泰初年，孫原貞以兵部侍郎鎮守浙江時就曾提出建議：「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勘居民并魚戶船隻，每縣定與字號，編定總小

63. 鄭若曾，〈黃魚船議一〉，《江南經略》，卷 8 上，頁 20b。

64. 鄭若曾，《籌海圖編》，卷 4 〈福建事宜〉，總頁 360-361、363。

65. 鄭若曾，〈海防論四〉，《江南經略》，卷 1 下，頁 24a。

66. 鄭若曾，〈松江府海防議〉，《江南經略》，卷 4 上，頁 15b。

67. 鄭若曾，〈論黃魚船之利〉，《鄭開陽雜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4 冊），卷 2，頁 64a-b。

甲」，「遇有賊船，協助官快船，四面夾攻，以取全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註 68)但這一建議未見施行，因此至嘉靖年間江浙才又有人提出。究其實，海上的漁甲制實為陸上保甲制的延伸。^(註 69)必須指出的是，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福建已獲准實施澳甲制。^(註 70)但這僅針對福建而言，江浙則在二十多年後才實施。而在嘉靖二十六年倭寇大舉入寇之後，官員皆思好好處理漁船問題。嘉靖三十一年（1552），分守寧波、紹興、溫州、台州等處參將俞大猷（1503-1580）曾建議「量處漁船」，將其編成船隊，漁船大的，二十五隻為一鯨；漁船小的，五十隻為一鯨，每鯨責令合造樓船一隻。漁船聯鯨出海捕魚，樓船則協同在海上巡防，可與軍船互相策應。^(註 71)嘉靖三十二年，給事中王國楨也曾經奏請：「除通番大船，及販易接濟應禁外，其捕魚樵採、無礙海防者，編立字號，驗放出入。」^(註 72)嘉靖三十四年，薛甲（常州江陰人）在給常州、鎮江兵備道王崇古的信上，也認為「宜令瀕海之民，仍舊樵蘇、漁採，或時有初入於法度，無害吾民者，少寬假之。」^(註 73)以上這些建議雖未馬上應允，但經過許多官員的努力，江浙漁甲制度終獲實施。

實際上，江浙漁甲制之獲准施行，與趙文華南來視師有關。嘉靖三十四年二月，趙文華以工部右侍郎身份，奉命至江南祭告海神並察視江南賊情。三十五年三月補工部尚書，五月以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浙江、南直隸軍務，至九月奉命回京。^(註 74)趙文華在江南期間，曾於嘉靖三十四年八月，調用寧波、紹興、台州、溫州的捕魚海船、下八山的採捕海船，與蘇州、松江的捕魚沙船，

68. 孫原貞，〈邊務〉，見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據崇禎刊本影印，1987），卷 24 〈孫司馬奏議〉，頁 11a-b。

69. 有關於明代的保甲制，參見陳寶良，〈明代的保甲與火甲〉，《明史研究》第三輯（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 59-66 轉 134。唐立宗，〈在「盜區」與「政區」之間——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秩序變動與地方行政演化〉（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2002），頁 390-395。

70. 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兵部覆御史白賁條陳備倭事宜，其中一事云：福建「海澳舟居之民，所有見丁，皆令報官，推立澳長一人，小甲二人，籍記澳民姓名，一船被劫，澳長、小甲，即率眾追之，仍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奏上後，報可。見《明世宗實錄》，卷 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條，頁 9b。這一條材料，以往學者（包括三木聰、歐陽宗書）均未提及。

71. 俞大猷，〈懇乞天恩亟賜大舉以靖大患以光中興大業疏〉，《正氣堂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伍輯 20 冊），卷 16，頁 7a-b。

72. 《明世宗實錄》，卷 401，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壬寅條，頁 6a。

73. 薛甲，〈與王鑑川兵憲書〉，《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 110 冊），卷 3，頁 6a。

74. 《明世宗實錄》，卷 419，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丙戌條，頁 9b；卷 433，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癸未條，頁 8a；卷 435，嘉靖三十五年五月甲子條，頁 2b；卷 439，嘉靖三十五年九月甲戌條，頁 5a；卷 443，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丁卯條，頁 1a。

「俱聽海道衙門編排字號」，與兵船協同防禦。^(註 75)趙氏回京後，仍以工部尚書兼江浙之職務，直至三十六年正月才命總督胡宗憲兼理。^(註 76)他在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又條陳了海防事宜六事，其「弛海禁」云：

濱海細民，本藉採捕為生，後緣海禁過嚴，以致資生無策，相煽從盜。

宜令督撫等官，止禁通番大船，其餘各聽海道官編成排甲，稽察出入，

照舊採捕。^(註 77)

此疏上呈後，發下相關衙門覆議，兵部議得：「通番大船應禁外，其漁樵等項船隻，逐一查出，令其自備器械，編成排甲，互相保結，驗放出入，無事照舊採捕，有警聽總兵等官調取，與同兵船相兼分布防守，通行遵照訖，先為申舊例，寬海禁以便漁樵，以裕國計。」^(註 78)最後，朝廷核准了趙文華所奏。趙氏此議之所以獲准，與內廷有深得世宗寵幸的嚴嵩給予支持有直接關係。不過，此一建議雖獲批准，但實際施行卻是在唐順之（1507-1560）前來視師以後。唐順之係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月，以兵部署郎中之職前往浙江、南直隸視師，與南直隸、浙江總督胡宗憲協謀勦賊。^(註 79)據鄭若曾《江南經略》云：嘉靖三十七年，「荆川唐公捧檄至吳，與督府梅林胡公、兵憲鏡湖熊公毅然弛禁，沿海數百里，窮民踴躍出海。自是厥後，海烽久熄，未必非由此以致之。」^(註 80)由此看來，他是在與總督胡宗憲、蘇松兵備道熊桴商議後，毅然決定弛漁船出海之禁，其措施則為：「每府漁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漁船回港之時，官府差官向其收稅，也於軍餉大有幫助。從此以後，「浙

75. 趙文華，〈條陳海防疏〉，《趙氏家藏集》（《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 19 冊），卷 2，頁 12a-b。《明世宗實錄》，卷 425，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壬辰條，頁 3b。

76. 《明世宗實錄》，卷 443，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丁卯條，頁 1a。

77. 見《明世宗實錄》，卷 442，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癸卯條，頁 3a。並參校勘記。另據范涑所編《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26 冊）云：嘉靖三十五年，胡宗憲題請乞降恩詔，內稱：「海上小民，近來海禁太嚴，生理日促，漁樵不通，轉而從盜」，並乞下該部，查其先年所奏海防事宜，再加奏請施行。見該書卷 5〈漁稅事宜·原考〉，頁 50a-b。類似記載，亦見於萬曆《紹興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00-201 冊），卷 23〈武備志·軍需〉，頁 17b-18b。推測當時情況，趙文華兼銜仍在，品秩也高於胡宗憲，應該是以趙領銜上呈，故《實錄》僅載趙氏之名。若就奏疏本身而言，實際撰寫者可能是胡宗憲，故實錄以外資料均記為胡宗憲所奏。

78.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 5〈漁稅事宜·原考〉，頁 45b。

79. 《明世宗實錄》，卷 465，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己未條，頁 3b。

80. 鄭若曾，〈海防論一〉，《江南經略》，卷 1 下，頁 18b。

直海濱不聞春汛之警」。(註 81)

而在漁甲制實施後不久，地方志即出現相關記載。如嘉靖四十年（1561）刻的《吳江縣志》云：蘇州府吳江縣有「魚甲（俗呼魚頭目）三十三人，轄魚船戶二千四百六十二。」(註 82) 平均每一漁甲約管束漁船戶七十五戶。不過，嘉靖三十七年所實施的漁甲制度或許還比較簡單，因此鄭若曾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呈給兵備道湯賓（1514-1585）的〈海防條議〉，仍談到編組漁民與漁船：

合行蘇州府諭令所屬州縣，通將各處願捕黃魚船隻，盡行查出。每十隻編為一幫，逐一刊刻字號。每一幫擇一甲長領之，責取連名，甘結在官，各發附近吳淞、崇明、瀏河、福山等營部下。造冊二本，內一本呈送兵道，一本呈送各該將領處查考。該府仍委官一員，查照先年事規，每船收稅銀一十兩，以充軍餉。(註 83)

漁船編定漁甲之後，「無事則分給旗票，俱從劉家河出海，聽其採捕。遇警則各營收哨食糧，合鯨勦賊」。另外，仍令各漁船「同編定青色旗號，以防混雜」。在海上作業時，「少有疑似，即放銃為號，合鯨併力擊之」。如果船團當中有「無編刻字號、旗號，一概混入者」，將其船充公。(註 84) 這個建議後來是否採行，尚有待查證。不論如何，漁甲制度從出現之後，不斷再加以細密化，應該是一個事實。

漁舟課稅

如前所述，由於嘉靖中葉江浙倭寇再起，對於漁民出海的管制轉嚴，後來地方督撫為兼故海防備倭與漁民生計，於是而有編組漁甲之舉。除此之外，嘉靖後期江浙海洋漁業管理措施轉向的第二步，乃是漁船出海課稅，而此是與編組漁甲互相搭配的。不過，這一辦法之提出，乃在漁甲制實施之前，設想者是巡視浙江、福建都御史王忬。嘉靖三十二年，他在條陳海防事宜時，奏請「議稅課以助軍餉」，其內容如下：

81. 鄭若曾，〈黃魚船議一〉，《江南經略》，卷 8 上，頁 20b-21a。

82. 嘉靖《吳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1987），卷 10 〈雜役〉，頁 25b。

83. 鄭若曾，〈海防條議〉，《江南經略》，卷 7 下，頁 45a-b。

84. 鄭若曾，〈海防條議〉，頁 45b-46a。

國初立法，寸版片帆，不許下海。百八十年以來，海濱之民，生齒蕃息，全靠漁樵為活，每遇捕黃魚之月，巨艘數千，俱屬犯禁。議者每欲絕之，而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與其絕之為難，孰若資之為用。合無容臣行兩省守巡、海道等官，將前項船隻，盡數查報，除小者不稅外，其餘酌量丈尺，編立字號，量議收稅，民自樂從，既可稽考出入，亦得少助軍餉。(註 85)

王忬提出以抽稅驗放的方式准許漁船出海，奏上之後得到朝廷認可，准許「閩浙魚缸，量議收稅」。(註 86)而其正式實施並訂出稅則，則在江浙奉准實施漁甲制之後。嘉靖三十七年，經巡鹽御史董威題定：「捕魚船隻，立一甲頭管束，仍要量船大小，納收稅銀，給與由帖，方許買鹽下海捕魚。所得鹽稅，以十分為率，五分起解運司，五分存留寧波府，貯庫聽候支用，俱遵在卷。議令各漁戶報名在官，每年參月以裏，黃魚生發之時，各納稅銀，許其結艚出洋捕魚，至伍月以裏，各令回港。」(註 87)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船稅銀、漁稅銀、鹽稅銀和旗銀，並非大家所熟知的漁課額。因為，自明初以來，官方既已禁止出海捕魚，海洋漁業自無所謂漁課之徵；而此時出現的各種出海漁船稅，與以往河泊所所收的漁課是不同的，乃是一種新的漁業稅。

當時，寧波、紹興等府針對出海較遠的漁船（主要為黃魚船），一律徵收船稅銀、漁稅銀、鹽稅銀和旗銀，稅則也較高，最高者為銀 8.1 兩；至於近港祇捕魚蝦、柴鹿的漕網小船以及河條溪船，稅則較輕。另外，對採捕墨魚、紫菜、泥螺等項海味的對桅尖船、鰲螳船、河條溪船，則僅徵收船稅銀與鹽稅銀，最低才銀 0.26 兩。(參見表一)至隆慶元年（1567），因清理浙江漁稅及鹽法，議准增收鹽稅，大雙桅船增至 2.40 兩，中雙桅船增為 1.20 兩，單桅船增至 0.60 兩，尖船桅船加至 0.48 兩，鰲螳船則收 0.36 兩，興河船（河條溪船）為 0.24，對桅船為 0.48 兩。(註 88)與之前相比，這年的鹽稅增加幅度甚大，除興河船不變外，大約在 250-400% 之間。

85. 王忬，〈條處海防事宜仰祈速賜施行疏〉，見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卷 283 〈王司馬奏疏〉，頁 29b-30a。

86. 《明世宗實錄》，卷 397，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子條，頁 1b。

87.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 5 〈漁稅事宜·原考〉，頁 45b-46a。

88.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 5 〈漁稅事宜·原考〉，頁 48a。並見萬曆《紹興府志》，卷 23 〈武備志·軍需〉，頁 19a。

表一：寧波、紹興漁船監稅則例（1558）

單位：兩／每船

船 名	船稅銀	漁稅銀	鹽稅銀	旗 銀	合 計
大雙桅船	4.20	3.00	0.60	0.30	8.10
中雙桅船	2.80	2.00	0.40	0.20	5.40
單桅船	1.68	1.20	0.24	0.10	3.22
尖船對桅船	1.12	0.80	0.16	0.08	2.16
鰲鯢船	0.70	0.50	0.10	0.05	1.35
近港不捕黃魚、止捕魚蝦柴 鹿漕綱小船	0.30		0.06	0.10	0.46
河條溪船	0.30	0.30	0.24	0.03	0.87
採捕墨魚、紫菜、泥螺等項 海味對桅尖船	1.12		0.16		1.28
鰲鯢船	0.70		0.10		0.80
河條溪船	0.20		0.06		0.26

※資料來源：萬曆《紹興府志》，卷 23〈武備志·軍需〉，頁 18b-19a。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 5〈漁稅事宜·原考〉，頁 46a-b。

溫州府方面，據萬曆《溫州府志》記載，所徵之漁稅銀為：大、中雙桅船為 2.00 兩，單桅船為 1.20 兩，尖船為 0.70 兩（應為 0.80 兩），鰲鯢船則收 0.50 兩，河條船為 0.30 兩。^{（註 89）}但後來官方察覺漁稅有助於軍需，乃藉由提高船稅或鹽稅，以補助海防費用之不足。但加增漁稅太過，反而使出海漁民受害。萬曆初年，王叔果（溫州府永嘉縣人，1516-1588）曾細述溫州漁稅銀之演變云：「永嘉之民，家于沿海者，置船捕魚，輸辦漁課，故無船稅也」。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來，因倭寇猖獗，兵船缺少，兵備道凌儒乃令：「凡魚船二十隻，內抽一船調哨，餘船量科銀數錢幫貼」。既而哨除，泰順知縣區益奉命查船編號，僉立號長。著例：

89. 萬曆《溫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10 冊），卷 6〈兵戎志·漁稅〉，頁 20b。

「凡尖船一，納稅銀八錢；鰵鯧一，納稅銀五錢。」嘉靖四十二年（1563），溫州府推官薛鑰奉命審度船隻，尖船加稅銀至二兩二錢，中雙桅船加稅銀至二兩四錢。其內雖遭風折損、被倭寇擄去，一概不未審明豁除，「船戶率稱困矣」。至隆慶六年（1572），泰順知縣王亮采奉命點視漁船，憐憫漁戶困苦，申明減稅，凡中雙桅徵稅銀二兩，單桅徵稅銀一兩，尖船徵稅銀九錢四分，鰵鯧船徵稅銀五錢。但萬曆四年（1576），命官點查漁舟，不分飄風、被倭或實在，大小船隻一概申報，中雙桅加稅銀至二兩八錢，單桅加稅銀至一兩六錢八分，尖船加稅銀至一兩一錢二分，鰵鯧加稅銀至七錢，「給票追徵」。^{（註 90）}由此看來，溫州的船稅銀在嘉靖四十二年大幅增加，隆慶六年稍加降減，但萬曆四年又有所增加。（參見表二）由於增添幅度甚大，故漁民感到負擔甚重。

表二：溫州府漁稅銀加增情況（1560s-70s）

單位：兩

年 份	中雙桅船	單桅船	尖 船	鰵鯧船
嘉靖三十七年（1558）			0.80	0.50
嘉靖四十二年（1563）	2.40		2.20	
隆慶六年（1572）	2.00	1.00	0.94	0.50
萬曆四年（1576）	2.80	1.68	1.12	0.70

※資料來源：王叔果，〈與當道議魚稅〉，頁 4b-5a。

另一方面，漁船出海往洋山海域捕魚，捕獲之後到寧波販售，寧波方面又責令其繳納漁稅、鹽稅。溫州漁戶艱辛的情況，官員們盡皆知悉，但「意在逢迎，拘泥故常」。更糟的是，漁甲體系中的號長、總甲，以及各縣吏胥等人，「恣意科斂，索詐行私」，有船者起初只要銀數錢，至萬曆初增至數兩。而無船者，「前名在冊，虛稅不除」。^{（註 91）}其實，這些漁戶之所以須出海，是有各種苦衷。王叔果續云：

90. 王叔果，〈與當道議魚稅〉，《半山藏稿》（《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第 11 冊），卷 30，頁 4b-5b。

91. 王叔果，〈與當道議魚稅〉，頁 5b。

夫瀕海居民，無田可耕，以漁為業，每人下船，船戶付僱身銀七錢，斷寫亡命交約，往往遭風覆溺，死葬魚腹，被倭殺擄，身膏寇鋒，生還者十僅四五，公私償費之外，所得幾何？死亡者，家屬招魂，哀怨哭泣之聲，接于江壤，此輩豈皆見利忘害，甘於蹈死者哉？第以所置魚船，業已報名在官，欲行變賣，則船與稅俱，誰肯承受；欲行拆卸，則稅額掛冊，莫與蠲除；況船即不發，稅已先追，不得已揭債冒險，仍往捕魚，暨獲微息，以完官稅。其飄失船隻，有能控告者，官司將伊稅銀，分攤見在之船，以足故額。不能控告者，照舊納稅，年復一年，甚至鬻賣妻子，流離逃亡，其困苦殆不勝言也。（註 92）

王叔果認為：「彼漁船科稅充餉，不過以其微取江海微利爾」，而今海上塗田、水沙，動以千萬計，「厚利輕糧」，多被豪強所占據，雖行經官衙清理，尚且酌情通融，何獨對貧民漁船，「盡法苛徵」？因船戶蔡子孝、韓皆親等向其投告狀詞，故他申請當道將所存船隻，新而堅固且願出售、已舊受損想要拆卸者，俱豁除其前項船稅銀，「庶有司催科不擾，而海氓更生可望」。（註 93）事後發展如何，待考。另據記載：何鈞在溫州府平陽知縣任上（萬曆二年至八年），曾對漁稅有所作為：「邑故有漁戶稅，魚徙戶絕，公請蠲之，而以水碓之稅償焉。」（註 94）這件事是否與王叔果有關，亦不可知。

四、萬曆以後出海管制的變遷

明代江浙的海洋漁業，從明初的不准出海捕撈，到弘治以後局部開放單桅小船可以下海捕魚，嘉靖後期又對雙桅以下漁船課稅、准以連鯨互保的方式出洋，呈現了持續開放的過程。然而，在實施漁甲制後，雖然無資料記載其成效，但時間一長可能流於形式，或者發現當中有不盡完美之處，故在其後仍不斷加以重申

92. 王叔果，〈與當道議魚稅〉，頁 5b-6b。

93. 王叔果，〈與當道議魚稅〉，頁 6b-7a。

94. 顧大韶，〈何公家傳〉，《炳燭齋稿》（《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 104 冊），總頁 583。

或變更方案。在此情況下，萬曆年間江浙漁船出海的管制措施，又有一些新的變化。

漁甲制的細密化

如前所言，漁甲制出現後仍不斷在變化，而從資料記載看來，其實施似乎也有地域性。據萬曆《杭州府志》記載：「初，寧波、溫、台近海漁戶，領海道漁鹽旗票下海捕魚，赴各縣行賈，年納稅課。」隆慶六年（1572）四月，杭州百姓張禧等，執紹興府蕭山縣漁戶船票出海販取冰鮮，至海寧縣赭山為巡檢司所查獲，申報至督撫衙門，行文蕭山縣究辦，將漁船充公，並委派錢塘縣林姓典史將冰窖拆毀。^{（註 95）}杭州百姓張禧等人之所以要領蕭山縣漁戶旗票出海販取冰鮮黃魚，可能是杭州在嘉靖年間並未被納入實施的範圍。

浙江自嘉靖年間實施漁甲以後，在萬曆初年曾進行重整。萬曆元年（1573），浙江巡撫方弘靜在〈整理海防疏〉中談到「編漁甲」云：「照得沿海貧民，別無生理，專靠捕魚以資衣食，於是下海之禁少寬，容其駕船出洋採取。但每年黃魚生發，時值風汛正殷，往往被倭搶劫，雖有編立漁甲之法，而處之未盡，無人約束，致有參差失墜，數遭其害，不惟資寇食用，甚至被脅嚮導，引劫居民，關繫甚切」，因此他提出重新整理漁甲的方案如下：

今議責委各府海防官，公同各縣掌印官，將本屬海邊漁船，盡數查出，以大船十隻為一甲，次小者十五隻為一甲，外立一甲首，以十七、八人一船者充之；每三甲外立一紀首，以二十人一船者充之；三紀外立一綱首，以二十四、五人一船者充之；三綱外立一艘長，以三十人一船者充之；五艘或四艘屬一哨長管束，還有機智膽勇、平昔服眾者用。造冊四本，繳臣并海、兵該道委官各一本，存縣一本。艘、綱、紀、甲船，俱許捕魚。哨長專一防護，船免納稅，仍帶划船二隻，以便傳報。^{（註 96）}

從方弘靜的奏疏中提到「雖有編立漁甲之法，而處之未盡」來看，先前的編制應

95. 萬曆《杭州府志》，卷6〈國朝郡事紀下〉，頁23a-b。

96. 方弘靜，〈整理海防疏〉，《素園存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1冊），卷14，頁15a-16a。

該是比較簡單。然而，這兩者有何不同？最主要的差別，應是嘉靖者缺乏層層節制，僅是鬆散地將船戶歸甲首管束；而方弘靜的方案是大船十艘爲一甲，較小者十五艘爲一甲，每三甲立一紀首，每三紀立一綱首，每三綱立一鯨長；在五鯨或四鯨中，再選機智勇敢足以服眾者充任哨長，專責防護船隊。即將漁船由下而上，進一步編組爲船戶→甲首→紀首→綱首→鯨長→哨長，其層級性、組織性相當明顯，軍事化的色彩也更強。在新方案中，漁船出海捕魚，來回均要「依次而行，不許攙錯落後」，惟恐有賊船埋伏於港澳攔劫，故哨長必須沿路提防。如有漁戶隱瞞不報入漁甲者，治以私自下海之罪，船隻入官。哨長防過一年，查其果有績效，給與冠帶榮身，以示激勸。漁船編籍既定之後，如遇有警之時，可以隨宜徵用，委派將官統領，給與船稅、口糧，聽候調遣防禦。平日則不妨礙其生計，任其出海捕魚。漁甲之制仍按保甲之法，責令各船戶互相譏察，若有私自出海「通番引寇與自行盜劫者」，同甲之人即報知哨長、鯨長或綱首、紀首、甲首，稟告官府追究。互相隱瞞不行糾舉者，事發一起連坐。^(註 97)總之，就甲內而言，各漁船是海上自衛組織，互相監視、彼此連坐；就甲外而言，其與兵船又互相協防，哨長又帶有准軍職頭銜，擔任的是軍事性的任務。

方氏此議遞送至京，發下兵部詳查，萬曆二年（1574）正月，經兵部覆奏云：「合將漁船盡數查出，編立甲首，即于捕魚之時，資之防寇。仍照舊規徵收稅銀，以爲修船、養兵之費。漁事既畢，即聽回生理。」此議旋獲神宗批准施行。^(註 98)在兵部覆奏獲准之後，方弘靜又去信兵部侍郎汪道昆云：「日者海防之疏，中間編漁甲一事，竊謂於地方小有所補，但言之未詳。觀部覆，似未察原題之意也，敢一陳之。」其中談到：「海洋之戰，習水者勝，故兵不如賊，賊亦未如漁人」，但漁船若單出遠洋，僥倖獨獲其利，不肯互相支援，突然遇上倭賊，則只能束手就擒。故編甲結鯨，其利有五。首先是「什伍聯接，賊不能輕近，可免被虜之患」；其次爲「海上旗幟蔽空，忽增十數萬兵，足張聲勢」；其三，「此輩非盡良善，密寓稽察，使不得乘間爲非」；其四，「給費不多，因其所利，以虛聲而得實用」；其五，「名籍在官，素有聯屬，臂指相使，一旦呼召，即爲勝兵，不勞而集」。而且，

97. 方弘靜，〈整理海防疏〉，頁 16a-17b。

98. 《明神宗實錄》，卷 21，萬曆二年正月乙酉條，頁 2a-b。

「彼皆以漁爲生，若以官約束之，則必生擾，故即於其中，擇可爲哨長者，免其稅，給一月工食，俟果有功，則與冠帶，計不過四、五名耳，非謂槩免各船之稅而又給之工食也，非謂盡籍之在官使不得生理也。謹錄原文瀆覽，伏惟炤察。」^(註 99)由此看來，兵部對於選立哨長一事，可能有所遲疑，故方氏特別在此澄清。

從方弘靜這兩份資料來看，編組漁甲的著眼點，實以國家安全爲先決考量，至於漁民安危則是這種考量下的一個環結而已。就目前所見資料而言，方氏設計的漁甲方案乃是明代最爲詳盡的。這樣的辦法，將浙江漁船與海防之間緊密結合，後續接任的官員對此多表支持。萬曆三年，浙江巡撫謝鵬舉對此措施曾有所論云：「大率沿海居民，生理寥落，半年生計在田，半年生計在海。故稻不收者，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淡水門洋面，乃產黃魚之淵藪，每年小滿前後，兩浙漁船出海捕魚者動以千計。這些漁民慣習風濤、器械鋒利、格鬪也勇敢，「驅而用之，亦足以捍敵，緝而稅之，尤足以餽軍」。先前「疑其接濟勾引而厲禁之」，遂使得民不聊生，只好從事非法勾當。殊不知能通番接濟者，乃是商販大船，在閩廣則有之；至若浙江海邊漁人，不過以捕魚爲生，「雇船覓利，其到埠入關，皆可按而稽也，其何亂之能爲？」是故，「緝名以稽其出入，領旗以辨其真僞，納稅以徵其課程，結鯨以聯其犄角」，「聽其自便，有以導民生之生，抑亦資其捍禦，其又得彼之用矣」。^(註 100)謝氏所論重在辨明：兩浙漁船與閩粵商船不同，並不出海接濟勾引倭人，抽稅准其出海捕撈，利用其生活技能，與兵船互相協防，海防與漁業可並蒙其利。至萬曆二十年（1592）年底，蔡逢時出任浙江溫州、處州兵備副使，他也覺得漁船納稅聯鯨出海，對於海防有極大幫助：「近議編立保甲，整擄器械，結鯨捕魚，有警與關游兵船併力攻勦，聲勢聯絡，則漁舟皆戰艦，漁人皆勁卒矣。」^(註 101)要之，漁稅可補軍費之不足，漁甲又可與兵船聯防，實爲一舉兩得。

蔡逢時在兵備副使任上，並曾對方氏舊法稍加變革。他蒞任後注意到：「本區漁戶，載籍頗多，且比海爲家，慣歷波濤。其船皆捐貲自造，極爲堅固。其人

99. 方弘靜，〈與汪司馬伯玉〉，《素園存稿》，卷 15，頁 11a-12a。

100.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 5 〈漁稅事宜·原考〉，頁 50a-b。

101. 蔡逢時，〈漁稅〉，《溫處海防圖畧》（《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26 冊），卷 1，頁 52a。並見萬曆《溫州府志》，卷 6 〈兵戎志·漁稅〉，頁 20b-21a。

皆父子、兄弟、親友、鄰里，情意相關，非比一時烏合之眾。內有曾經戰陣，不以倭爲懼者。故先年藉以防寇，將應輸漁稅盡減其半，責令聯號結鯨，而立鯨長以統之，如營兵之法，臨敵無不用命。」^(註 102)故他覺得有必要再申飭漁甲聯鯨之法：

業行永（嘉）、樂（清）、瑞（安）、平（陽）四縣掌印官，各將該縣大小漁船，盡數報官，毋容隱漏，照依原立字號，挨編明白，書於船尾。仍備開某縣某都鯨長某人，統船若干隻，內船戶某人，各取年貌、籍貫，置立格印腰牌，常川懸掛。仍於概縣鯨長之內，選舉德行素著、臂力出眾、有身家、可以服人者一人，結報本道，給以冠帶，為千總。鯨長給以執照，為百總。各船聽命于百總，百總聽命于千總，上下相承，如臂使指，敢有違慢，聽其責罰。船內多帶石子、灰瓶，仍書「捕魚剿寇」四大字于旗，晝則揚旗而漁，夜則懸燈，聯鯨而泊，以便識認。島夷知我舟師之眾，先褫其膽，不敢輕犯矣。^(註 103)

蔡逢時所提新方案與方氏舊制不同之處，在於舊制由各鯨長中選立哨長，任滿一年，有績效者，授予冠帶。蔡氏新法，則鯨長即授予百總冠帶，再由各縣鯨長之中選立一人，給予千總冠帶，統率縣內諸鯨長。故新法由下而上，為船戶→甲首→紀首→綱首→鯨長（百總）→千總。另外，蔡氏也命令漁船聯鯨出海，白天必須張掛寫著「捕魚剿寇」四大字的旗幟，晚上則要懸掛燈籠，漁船軍事化的色彩較前更加明顯。不過，為恐漁船出海被搶，賊寇乘駛漁舟入港，官兵無法察覺，蔡氏認為應預先與各漁船約定，平時俱要懸旗、張燈，一被賊寇劫持，便將旗幟、燈籠拋棄，則我方軍兵知覺，可以加以救援，也不致有所失誤。^(註 104)

在南直隸方面，萬曆十七年（1589），漕運總督舒應龍曾建議：「江南出海船隻，比照江北漁船，編立船甲，互相覺察，但顧與下海之人行劫者，以分贓未分擬坐辟戍」。呈上之後，朝廷准從所議。^(註 105)這則記載令人迷惑的是，從前文所

102. 蔡逢時，〈集漁船〉，《溫處海防圖畧》，卷 2，頁 72a。

103. 蔡逢時，〈集漁船〉，頁 72a-b。

104. 蔡逢時，〈集漁船〉，頁 72b-73a。

105. 《明神宗實錄》，卷 210，萬曆十七年四月辛丑條，頁 7b。

述可知江南在嘉靖三十七年已編組漁甲，但為何此處又言比照江北編組漁甲？或許可以從兩方面思考：其一，其所指並非漁船，而是泛指所有船隻，也就是出海船隻皆編為船甲，若是如此，則漁甲制後來推廣為船甲制。其二，係針對漁船而言，則可能江南的漁甲制，在實施後逐漸廢弛，故在此重新加以整頓。

漁船分省採捕

明代後期，對於各省商船，定有不得穿越省界航行的禁令。萬曆二十五年，因有船隻越禁，浙江海兵道曾重申禁令：「照得兩浙沿海地方，南船不許入北，北船不許入南，先年立碑厲禁，至於商人納稅，著有定例，恪遵無犯。近訪乃有狡猾船戶，引誘客商，不遵碑禁，攬裝雜貨，撩洋直去台、溫，復又兜載南來糖、靛，徑回大洋，直至吳、蘇」，為此特地示諭，申嚴禁約。^(註 106)除了吳船不入浙，浙船不入吳之外，閩、浙商船同樣不准越界往來，此即所謂的「閩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閩，俱限溫、福分界，沙埕地方換船，此向來通行之禁也。」^(註 107)

萬曆年間，江浙海洋漁業的管理，除了漁甲制進一步細密化之外，在萬曆後期還規定漁船不得越界捕魚。此一措施出現的背景，乃因當時福建海賊猖獗，浙江方面為防止福建漁船越界為浙江海防帶來困擾，故有此設計。事緣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管杭州、嚴州道浙江參政王在晉於上呈浙江巡撫高舉的〈防海七事〉中談到「禁漁船」云：

防倭者，無不議禁漁船，而不知漁船之不能盡禁也。漁有船稅、魚稅、鹽稅、旗稅，官取給于漁，漁能不取償于海乎？海者，漁之田也，非漁而沙民無以聊生矣。然漁不禁，則船益多，而召倭起釁，不可勝詰，惟即平時所禁諭者，再一申明之。曰遠洋當戢也。戢遠洋以杜搶掠之患，我兵不至混淆瞭望矣。曰印旗當給也。給印旗以示懸繫之法，官兵庶可辨明色號矣。曰越釣當禁也。禁越釣以遏閩船之入浙，則閩人不得為倭引導矣。每年三、四、五月出汛之期，通行嚴禁，敢有繫簷于要衝應禁之地，操舳于廣洋遠澳之間，不遵號旗，自立名色，併福建漁船擅入浙

106. 見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卷 5 〈漁稅事宜·申諭〉，頁 65a-66a。

107. 王在晉，〈禁通番議〉，《越鐫》（《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4 冊），卷 20 〈議〉，頁 16b-17a。

區地面者，許官兵擒拏解處，以違禁論罪，當不至藉寇兵而滋禍矣。(註108)

此議上呈後，經浙江巡撫高舉批允施行。其實，王在晉所建議者並不祇閩浙分界，另外還有「遠洋當戢」與「印旗當給」等措施。「遠洋當戢」在禁止漁船赴遠洋採捕，以免有被倭寇劫掠的危險。「印旗當給」則給予每個船團各自的旗號，官軍易於掌握和識別。至於「越釣當禁」，福建漁船不准進入浙江海域，比較不會將倭寇引入浙江海面。至萬曆四十年（1612），浙江巡撫高舉上奏建議「閩船之入浙者當懲」，兵部覆議認為宜如所議，朝廷允之，並將其列入新增的〈通倭海禁六條〉之中。(註109)自是以後，閩浙漁船各有畛域，不得互相越界捕魚，特別是福建漁船只能在臺灣海峽捕撈，不得至浙東海域作業。而在浙東沿海的漁船，王在晉也「行令正官編令保甲，溫、台、寧、紹、杭、嘉六府，沿江近海船埠、船匠，俱籍名報官，如有打造異船，及裝載奸商貨物者，一一根究。沙民及漁民業海者，各船頭目開報姓名，填寫官旗、船票，開明某處採捕，限日回銷。止許駕使艚網、黃家塘白艚、香挑漁喇小船，于近海生理，不得遠出大洋，搭廠久居絕島。」(註110)相對於萬曆中葉以前，出海管制似乎較為嚴革。不過，實際執行成效如何未可知，或許徒為具文而已。

有關於江浙漁船是否分界，個人尚未見到記載。然而，閩浙既已分界，則江浙或許也有這樣的可能。而在萬曆末年，朝廷仍不斷重申海船分省營業之禁。如萬曆四十一年（1613），因浙江嘉興縣百姓陳仰川、杭州人蕭府、楊志學等百餘人潛往日本貿易被緝獲，巡按御史薛貞覈實後報聞，並奏請申飭越販之禁云：

江南與浙之定海、楚門、石塘、石浦、馬墓等處，江北之通州、如臯、泰州、海門等處互相往來，是在一體禁戢，使浙江之船不得越定海而抵直隸，江北之船不得越江北而走浙江，則通倭無路，而鄰國不至為壑矣。

(註111)

108. 王在晉，〈防海七事〉，《海防纂要》（《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17冊），卷5，頁12b-13a、23a。並見王在晉，〈防海八議〉，《越鐫》，卷18〈兵政〉，頁11a-b。

109. 《明神宗實錄》，卷496，萬曆四十年六月戊辰條，頁2b-3a。

110. 王在晉，〈禁通番議〉，頁17a-b。

111. 《明神宗實錄》，卷513，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乙酉條，頁1a-b。

疏下兵部，部議以爲然，朝廷從之。這一禁令指涉的對象爲所有船隻，也許亦包括漁船在內。另外，在天啓七年（1627），有福建人王清等駕駛巨船，號稱是「閩省義兵」，船團聯鯨越過浙江境內，浙江巡撫潘汝禎「恐其假托橫行，防賊者即自爲賊」，於是上奏乞請申嚴海禁。奏上後奉聖旨：「浙、閩俱瀕海鄰倭，向慮姦民勾引，各厲禁船隻不許往來，突有王清統率多船，入境停泊行使，是否勦賊，是否奉閩撫明文，既經該撫移咨閩中查究外，以後還著各遵舊禁，嚴緝彼此境上流突，以絕地方姦利之民勾倭生端。」^{（註 112）}聖旨的內容，還是重申海船不得越界往來。

晚明江浙的海洋漁業

在嘉靖以來海洋漁業管理政策持續開放的趨勢下，萬曆以後江浙漁業的發展呈現日益擴大的情況，而以往禁止漁船出海的歷史反而受到懷疑。清朝初年，上海人曾羽王（1612-?）曾回憶道：小時候「每見老人言，嘉靖末年海上倭起，海禁甚嚴，寸板不許入海。然此耳聞之言，疑信相半也。」^{（註 113）}由這段話可知，嘉靖年間漁船出海一度緊縮的情況，已經成爲眾人半信半疑的陳年往事。

漁船出海的管制，即已有條件解禁，漁民出海自然較爲自由。萬曆初年就有資料談到：「邊海之人，南自溫、台、寧、紹，北至乍浦、蘇州，每於黃魚生發時，相率赴寧波洋山海中，打取黃魚，旋就近地發賣。」^{（註 114）}萬曆《杭州府志》（萬曆七年刊）記石首魚時也指出：「四、五月中，杭人多載冰出洋，販至省城賣之。」^{（註 115）}甚至在錢塘江中游的嚴州府桐廬縣，當地漁民也常「駕巨舟泛海捕黃魚，至一月二、三次，往杭貨賣其時鮮。」^{（註 116）}嘉興府境內，漁船出海也相當多。萬曆初年，沈懋嘉曾歌詠乍浦鎮的鮮船云：「鮮船都在水西棚，三尺黃魚似絳繒。陣陣腥風朝市歌，紅船影裏買春冰。」^{（註 117）}在萬曆末年，嘉興府海鹽縣漁民，「海

112. 《明熹宗實錄》，卷 82，天啓七年三月丁丑條，頁 11a-b。

113. 曾羽王，《乙酉筆記》，收於《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3-4。

114. 《明神宗實錄》，卷 21，萬曆二年正月乙酉條，頁 2a-b。

115. 萬曆《杭州府志》，卷 32〈土產〉，頁 12a。

116. 乾隆《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影印乾隆元年重修本，1967），卷 106〈物產六·嚴州府〉，「黃魚」條轉引《嚴陵志》，頁 37b。

117. 沈懋嘉，〈當湖竹枝詞十首〉，見沈季友編，《橋李詩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5 冊），卷 13，頁 59a。

上業捕魚者」，約有二百家，「名魚戶，戶納魚課，始得捕」。捕魚之法，「有捕、有關網、有石斷、有退簍及鉤、墾等法。遠捕用船，近捕用簍、竝櫓、搖櫓，亦能破浪行也。」^(註 118)至於松江府地區，據萬曆末年陳繼儒（松江華亭人，1558-1639）記載：「吾郡自吳淞之南石、皮勒、五墩、四團、滌闕、曹涇、青村、高橋、柘林、大門、張堰、金山嘴等處，一帶三百餘里，沿海居民，業靠漁樵，大戶出船，小戶航海，恃海養生，甚致巨富。船有圍漕、雙桅、火棚之類，及百餘人。」^(註 119)另據資料指出，明末上海青村的海船，雖遠不及柘林之多，亦約有五、六十艘，「一日兩潮，大魚則數十金計，小魚亦以兩計。」^(註 120)又，長江口的崇明島，在清初重申海禁前，有雙桅大船千餘艘，這些船隻按其前往的海域及捕撈的方式，各有南洋、北洋、大簍、網艙等稱呼。島上的漁船通常在春季時出海捕魚，故名爲春熟。而在魚汛過後，漁船則多載運樵柴溯長江西上販賣，稱爲柴汛。^(註 121)

除了江南各地之外，浙東寧波的漁業也是蓬勃發展。萬曆年間，屠本峻（寧波鄞縣人）有詩云：「百十魚鱸下海門，布帆五色若雲屯。甬東北岸鄞江上，習習腥風五月繁。」^(註 122)又云：「四月黃魚市，風腥海客場。餘腥凌出沒，喧雜起帆檣。」^(註 123)這兩首詩所詠者，正是每年四、五月寧波黃魚船出入的景況。據屠本峻記載，每年東海上黃魚、鰮魚的漁汛爲：

四明海上，以四月小滿為頭水，五月端午為二水，六月初為三水，其時生者名為洋生魚。其鰮鰯也，頭水者佳，二水勝於三水。八月出者名桂花石首。臘月出者為雪亮。其鰮魚出此時者，名亦如之。^(註 124)

由此可知，黃魚出現的季節有三，即四月至六月初、八月、冬月。夏季這三水來的黃魚稱爲洋生，八月者稱爲桂花，冬月者稱爲雪亮。由於漁獲量最大的乃是前

118. 天啓《海鹽縣圖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08 冊），卷 4〈方域篇·風土記〉，頁 15b。

119. 陳繼儒，〈備倭議〉，《陳眉公先生文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刊本），卷 60，頁 10b-11a。

120. 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10。

121. 康熙《重修崇明縣志》（《稀見中國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92，第 1 冊），卷 6〈風物志〉，頁 2a。

122. 屠本峻，〈甬東江北歌〉，見胡文學編，《甬上耆舊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4 冊），卷 20，頁 20a。

123. 屠本峻，〈生意〉，見《甬上耆舊詩》，卷 20，頁 22b。

124. 屠本峻，《閩中海錯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0 冊），卷上，「石首」條，頁 10a-b。

者，故明代資料談到黃魚，往往說「每歲三水」。當時，許多富室從海上賺取了不小的財富，大學士沈一貫（寧波鄞縣人，1531-1615）的舅舅洪靜峰就是一例。據沈一貫云：「吾舅靜峰公，椎牛釀漿，浮舡鯨於大海漁魚，魚入襪襖百具，舉錕成雨。」^(註 125)顯見其漁獲量甚多。萬曆年間，王士性記及浙東漁業時曾指出：每年五月黃魚大至時，寧波、台州、溫州的漁民，相率以巨艦至蘇州之洋山捕取。「每歲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魚如山排列而至，皆有聲。」漁船在海上作業時，漁師以近似聽筒的工具，垂入海中聽魚聲，若魚聲向上即下網，向下則否。掌舵的舵師則夜看星斗，晝用羅盤，「平視風濤，俯察礁島，以避衝就泊」。另外，從造船到海上作業，均有所分工，其中「長年」幫船主造船並招募漁工，每船約二十餘人。在船上，漁師、舵師、長年三者最尊，可以平起平坐，其餘船工受長年管束。若果有所違犯，長年即執行船規，甚至「箠之至死，不以煩有司」，故時人稱黃魚汛時的長年為「五十日艸頭天子」。船中所有的床，均為吊床。水則計日載水食用。船上並載鹽備用。到達海上，雖聯舟下網，但際遇好壞難料，有些網得魚多，反怕船被其拖下沉沒，常將魚網割斷，有些則「空網不得隻鱗」。然每次出海以日為期，到期不管有無漁獲，必要返航。返航時多至寧波漁港發賣漁貨，這時漁船入港，往往綿綿長十里。至於捕魚的獲利，其運氣佳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差的則要「貸子母息以歸」。漁貨賣完後，「仍去下二水網，三水亦然」。當時習慣，「獲利者，鏐金伐鼓，入關為樂。不獲者，掩面夜歸。」不過，即使十年沒什麼獲利，只要一年大獲，甚至可以償付十年的損失，但還是有歷經數十年無法大撈一筆的。因此，「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註 126)不論如何，即使有人獲利、有人虧損，明代後期的寧波，還是船隻來往如織，既使至明末，其漁業盛況猶然。順治年間，高宇泰回憶寧波的漁業云：「自立夏至夏至，民家多往海中，取石首魚晒養，謂之洋生船。每進桃花渡，百艘銜尾而至。」又云：「舊時鄞人生計全藉此，時有因之起家者。四方人俱載紬緞、重貨而至，以貿易白鯊。又有做魚膠船，利亦不貲。」浮橋東北沿岸，民間市廛分夾東西，是為後塘街，其繁榮不減蘇州之南濠、福州之南臺。^(註 127)對比於萬曆時的漁船入港綿綿長達十

125. 沈一貫，〈洪妣計太儒人序〉，《喙鳴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57冊），卷3，頁43b。

126. 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頁75-76。

127. 高宇泰，《敬止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8冊），卷34〈歲時記考〉，總頁631。

里，這時的情況還是毫不遜色。

在明代後期，江浙漁業最值得注意的，乃是江南、浙東冰鮮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明中葉以前，冰鮮漁業主要在江南的蘇州、松江、杭州、嘉興等地，至明末清初，浙東寧波等地也採取這一保鮮的方式。另外，據鄭若曾在嘉靖（1522-1566）末年指出：素以捕冰鮮聞名的蘇州沙船有一個新的變化，即「往昔捕魚，皆沙民爲之，今內地大家亦有」。其所以出現這樣的改變，乃因爲：「出海捕魚，不如持銀與南洋魚船見買，得先還蘇，其價倍蓰，其利可必。故內地富家，或賃人舟出洋，乃販也，非捕也。」自此以後，江南內地富家以船隻出海，專門收買浙東（南洋）各船所捕的鮮魚，收買之後立即載回蘇州販售，由於在海上停留時間較短，漁貨較爲新鮮，價格相對較高，獲得的利潤更大。其出現時間，應該是在漁甲制施行、准許繳納漁稅出海之後，即約在西元 1560 年前後。於是，冰鮮漁業內部出現分工，在從事捕撈的鮮魚船（或稱冰鮮船）之外，又出現了專門收買冰鮮的販鮮船（或稱收鮮船）。販鮮船的出現，使冰鮮船可以節省返航的時間，持續在海上進行捕撈，增加漁獲量；而販鮮船直接在海上進行收購，不用投入採捕作業，即可返回漁港將魚鮮出售。^{（註 128）}這樣的發展對於海鮮的供應，自然有相當大的幫助。由於海洋漁業發達，海產供應充足，江浙人們能吃到海味的機會甚大。據曾羽王回憶，萬曆四十六、七年（1618-1619），他七、八歲時，「海味之盛，每筵客必十餘品」，其中最被稱美的河豚，一份也才銀五、六分而已。^{（註 129）}天啓七年（1627），陳函輝（台州府臨海縣人，1590-1646）談到其客遊紹興，「初夏新嘗黃魚，冰鮮也，不減故鄉海市。」^{（註 130）}由此可知，他吃到的冰鮮黃魚，並不比家鄉海市的新鮮黃魚差。其〈黃魚十首〉詩云：

異國新鱗貴，盤餐不易供。乍聞冰筴品，遙識海船封。柳線穿鮮頰，椒
盆佐午餐。素心芬淡口，何必侈駝峰。^{（註 131）}
味能兼眾鱠，色亦映新醅。但得時時有，何妨頓頓來。供廚烹尚潔，遠

128. 參見邱仲麟，〈冰窖、冰船與冰鮮：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鮮漁業與海鮮消費〉，《中國飲食文化》1:2 (2005)，頁 51-56、58-59、61。

129. 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3。

130. 陳函輝，〈黃魚十首·序〉，《客椒自刪》（收入《小寒山子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85 冊〕），〈戊上〉，頁 11b。

131. 陳函輝，〈黃魚十首·其三〉，頁 12a。

海價高擡。……(註 132)

看來冰鮮黃魚的色澤與滋味，均可算是上品，只是紹興離海較遠，貨源供應較不充分，價格自然也就要貴一些。實際上，明末由於東南沿海海盜猖獗，漁船出海風險日增，海產價格漸次上漲。曾羽王曾云：「鼎革時（1644），余年三十有六，而海中捕魚者不絕，其價增至數十倍。」又說：「金山沿海一帶，向擅魚鹽之利，海味中最佳者，有鮆魚、河豚、黃魚等，「憶余兒童時，海中有裙帶魚，其價甚賤，每斤（銀）三釐，人莫之問。及余三旬後，此物每斤三分，後增至五分，人爭珍之爲上品，其製法亦與前迥別。」^(註 133)不論如何，即使海產價格日漸上漲，但要吃到卻不成問題。

結論——兼與清初對比

任何產業的興衰，都離不開內在與外在的條件，明代江浙地區的海洋漁業亦然。在明代中葉以前，江浙雖有東海這一海洋資源極爲豐富的漁場，但受到官方海禁政策的制約，即使有不少漁民違禁出海，這一有利的條件並未能充分開展。不過，明代的海洋漁業管理，在海禁政策的陰影之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揆諸以上所論，明代江浙海洋漁業的管理，可以分爲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洪武至成化年間，這段時間對於漁船出海的管制甚嚴，漁民通常違禁出海捕撈。第二個階段則自弘治年間至嘉靖中葉，已逐步開放單桅小船出海捕魚。第三個階段爲嘉靖後期至萬曆中葉，實施漁甲制，編組漁船聯鯨出海，對兩桅以下漁船，徵取船稅銀、漁稅銀、鹽稅銀及旗銀。第四個階段則爲萬曆末年至明亡，這一時期除延續第三階段的政策之外，又出現了漁船不得跨越省界赴它省海面採捕的規定。

明代中葉以後，因著官方對出海捕魚的管制逐漸放寬，江浙海洋漁業較諸之前愈益盛，海產的供應相應也較爲充足。至順治年間，因爲鄭成功在海上，清廷嚴格執行海禁，江浙居民能吃到海魚的機會大大降低。據曾羽王回憶：滿清占領江南之初，海禁尙不甚嚴，雖「歲奉嚴密，猶得易船而筏，人可備食諸味」。順治

132. 陳函輝，〈黃魚十首·其十〉，頁 14a。

133. 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4、35。

十六、七年（1659-1660），即使開排竹出海亦在禁例，人們只好在塗次張網。而在康熙二年（1663）蘇納海、宜理布到任後，「家有藏網，以叛逆論，而居民遂無可下手矣」。這一年，「海中魚盛之極，漂入海灘，居民與兵丁爭拾之。然居民拾者，一見兵丁即委去，惟恐罹於法也。」不過，當時雖不准捕魚，撿拾蝗及海鰱之類，還不在禁制之內。至同年六月，撫按派員至海邊樹立界牌，上書「居民過限者梟示」，於是「海中之物，無一可取矣」。(註 134)至此，幼年時無人過問的帶魚，甚至變成眾人懷念之物。這年冬天，傳言杭州有人賣此魚，每斤要價銀一錢三分，而上海人只能羨慕而已。(註 135)曾氏又云：「自鄭成功嘯聚海上，金山沿海一帶，無敢出行塘外一步者」，由於海禁極嚴，當地人常自問：「此生未知果能再嘗與否也？」康熙三年因鄭氏內亂，麾下相繼投降，六月時梁姓提督至青村，喚蔡某至灘塗上捕魚，獲海鮮五十餘斤，梁某喫後讚不絕口。青村人黃徵等趁機跪請，於是准青村人於灘塗上捕魚。(註 136)

由於當時海禁甚嚴，黃魚船無法出海採捕，魚鮮難以取得，人們要吃到江浙盛產的黃魚鯊並不容易。吳偉業（蘇州太倉人，1609-1671）曾有〈鯊〉詩云：「舊俗魚鹽賤，貧家入饌輕。自漸非食肉，每飯望休兵。餘骨羶何附，長餐臭有情。腐儒嗟口腹，屬饜負昇平。」(註 137)而冰鮮黃魚也成了人們難以忘卻的滋味。清初，彭孫貽（嘉興海鹽人，1615-1673）曾有詩云：

少時饕餮快擊鮮，黃魚但飽不論錢。而今疏食止鮭菜，不向鮑肆猶流涎。
兩年戎馬斷海口，無復飛鮮登石首。饒夫鶴頸望滄溟，瘦殺銀花鱸腥手。
憶昔貢魚來市橋，飛舠聒地喧鳴鏹。家家開冰出黃玉，插徧江南萬柳條。
朱門公子恣一噉，不讓飢獺逢鱸鱖。東海老僧脂病吻，吳門刺客舞庖刀。
邇來斷罟掛蛛網，仙醋流芳空握椒。啗鯨摧頽頭禿喙，彈鋏餓瘦馮公腰。

.....(註 138)

134. 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14-15。

135. 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35。

136. 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33。

137. 吳偉業，〈鯊〉，見《梅村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2 冊），卷 10，頁 18b。

138. 彭孫貽，〈海禁厲黃魚不復登嘲嗜魚者〉，《茗齋集》（《四部叢刊》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75），卷 6，頁 39b。

這首詩所描述的心情是：年輕時黃魚船回到漁港，船艙內盡是冰鮮，由於到貨量大，黃魚價格不貴，故得以飽啖黃魚。而今禁止出海，海口船影斷絕，魚罟也結滿蜘蛛網，魚店中再無此物，老饕是望斷秋水，料理海鮮的廚子亦無用武之地。約略同時，汪琬（蘇州長洲人，1624-1690）的詩，也傳達出昔日吃黃魚的心情：

三吳五月炎蒸初，棟樹著雨花扶疏。此時黃魚最稱美，風味絕勝長橋鱸。
憶昔東南全盛餘，海舶銜尾張網罟。公然滿載返吳市，市中雜遝羅擔夫。
柳條貫鰓冰貯腹，數尾僅直千青蚨。豪門膳宰善烹治，劑以醢醬芼筍蔬。
芳鮮頓覺溢几案，主賓下箸爭歡噉。須臾飽食共摩腹，餘羹猶飲長須奴。
自從洲島阻兵燹，鯨鯢竄逸稽天誅。詔書尺一禁航海，漁師安敢颺揚蒲。
蛤蜊海貝尚難致，況望此魚供客需。黃金為鱗白玉質，中裹膏液尤推腴。
老饕雖患食指動，畏觸禁令生佗虞。吳儂日夕歎且吁，有司束溼嚴錙銖。
何當小醜就拘執，舳舻往返如通衢。船趁風中販蠹至，此魚復得登庖廚。
吾儕口腹詎足校，但願海晏波濤除。廟堂日俟羽書捷，戈船諸將今何如？

（註 139）

汪琬此詩所述，雖係友人向其談及的心情，但從詩中可知，在海禁嚴格執行前，每年五月黃魚汛時，江南販鮮船滿載而歸，不僅商人因以得利，挑魚夫也工作繁忙；且對中上階層而言，黃魚價格已屬便宜，幾尾才千文錢，購得冰鮮，宰來烹飪，賓主飽餐一頓，真是一大開懷事。但自禁海令實施後，漁船不敢違禁出海，連蛤蜊、海貝都吃不到，黃魚就更不用說了。正如吳偉業「每飯望休兵」一樣，老饕們祇能祈願海上儘快安靖，早日可以再吃冰鮮黃魚。江南人這種想吃黃魚的期待，直到海禁解除才如願以償。

而當禁海令嚴格實施之時，受到影響的自然不僅江南、浙江海域，山東、蘇北及福建等地的漁民同樣不准出海採捕。^{（註 140）}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重開，漁船得以出海，大家才展開笑顏。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仲儒（揚州人，1634-1698）曾賦詩云：「海禁都開好販鮮，團南團北動漁船。江南櫻笋佳時節，

139. 汪琬，〈有客言黃魚事紀之〉，《堯峰文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5冊），卷41，頁19b-20a。

140. 參見顧璣，〈明清海禁與漁業〉，頁52-56。

紫蛤黃魚勝往年。」^(註 141)由此可見禁海令一除，長江口的漁船紛紛出海，販鮮船亦得以展開生意。歷經數十年的海禁，因漁船無法出海捕撈，魚類得以大量繁殖，遂使開禁後的漁獲量大盛，這或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附記：本文初稿曾於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華南研究會等單位主辦，「200 年華南研究會年會」(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2004.12.19-20)會上發表，感謝梁洪生、常建華、黃向春等先生惠賜意見。此外，三位匿名審查人細讀拙文，提出寶貴建議，於此亦致上誠摯謝意。

141. 王仲儒，〈東場竹枝詞〉，見《西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3 冊)，西齋戊辰詩，頁 4b-5a。

Transformations of Regulations on Marine Fishing near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fishing was prohibited near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by intense restrictions from the policy of maritime interdiction. This restraint caused serious hardships for survival; thus, fishermen would go fishing regardless of breaking the law.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y,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conditionally permit only single-mast fishing boats to fish in the coastal areas. Though this regulation was once terminated due to Japanese pirates' activities in the 1540s, in 1558 the government allowed double-mast or smaller fishing boats to develop a self-defense and fishery taxation system for fishing near the East China Sea. After 1574, the self-defense marine-fishing boat organization became more elaborate; a bottom-to-top systematic control and militarization became heavily emphasized. In 1611, the government even forbade fishing in waters of other provinces. Following gradual relaxation of restrictive policies, the fishing industr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managed to prosper and reached its prim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mong others, coastal inhabitants enjoyed opportunities to savor seafood brought in by fishing boats equipped with cold storage. However, the policy chang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began to limit marine fishing again, this time even more forcefully. And, in 1663, borders along the coastline were set up to forbid inhabitants to trespass. Thus, the seafood supply was halted and people had no seafood to eat.

Key words: Ming Dynasty, maritime interdiction, self-defense marine-fishing boat organization, fishery taxation, marine fishery

(收稿日期：2005.4.13；通過刊登日期：2005.11.22)